



## 谈设计速度与坚持专业原则

孟建民

非常高兴参加此次论坛，我觉得“速度的悖论”，听起来像哲学层面上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要思考和面对的，在我们的创作习惯中，经常面对的是快餐式设计。如果从宏观角度思考问题，我认为快速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特征。它虽然存在问题，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建筑师是被推着走的一部分人，想慢下来，只能是一种理想。大家虽然知道慢设计会产生比较好的结果，慢工出细活嘛，但是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产生的垃圾建筑也只能说是时代的产物。但往深处想，这与业主、决策者、开发商的利益诉求是相关的，这背后隐藏的是体制问题。一届政府、一届领导人，在他这届任期内，肯定想要看到建成效果。背后决策者的政绩观和开发商追求最大效益，抢占市场先机，都是急功近利的表现。作为设计师，我们在快速、甚至超速的决策中被推着往前走，出了问题，建筑师是终身负责制，领导换一届就完了，而最后的责任还是建筑师的。因此建筑师要学会自我保护，不能轻易地答应业主、决策者的不合理要求。我经常提醒大

家，不要甲方说什么我们都回答：是是是。我过去经历过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当年做深圳市政府会议楼时，一位市领导在审查我们方案时说休息廊太宽了，要改成1.5 m。我没有正面回应，还是按4 m宽来做，因为他说完以后过几天可能就忘了，如果按他的意思做，回头我们肯定还要挨批评，毕竟他不是专业的建筑师。所以一定要坚持建筑师自己的专业原则，在做设计的速度方面也应该这样。

有一次我参观平遥古城，听说当年建古城的时候，时间周期要求非常严格，一年建多少，有严格的规定，绝对不准超期，超期就要罚款。比如一年计划建100 m，如果提前建完也要被罚款。我经常拿这个例子告诉领导，他们也觉得有道理，但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提倡的慢设计、慢生活，就是指在合理的情况下，尽量达到设计的品质要求，这是我们的底线。我认为建筑师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怎样把握适度，怎样保证自己的责任与权益，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思考。



## 速度与效率的论证

朱競翔

我自己的团队刚刚参加完深圳第13届中国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布展工作。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团队和深圳的大型制造公司合作展示了一个200 m<sup>2</sup>的房屋，这是个高质量的预制房屋原型，一个下午即可建好，从构件运到现场再到入住，只用了两天时间。我个人觉得中国不是要慢下来，而是该快的还不够快。我举身边的几个例子：第一个，郎咸平教授最近在沈阳有个长篇报告，说美国很多企业规划在2015、2016年把生产工厂搬回北美。原因很简单，过去他们的企业被我们中国的低工资所吸引，现在我们的工资不停增长，产出与工资的比率逐渐比不上北美的竞争力。第二个例子，半年前碰到都市实践的刘晓都先生，他说现在新员工工资增长的速度远远比不上他们产出或质量提高的速度。从经营的角度看，当工资增长的速度和产品品质提升速度不匹配时，公司自然就到香港聘用人手，虽工资不低，但工作效能更高。第三个例子，香港中文大学有位很优秀的瑞士教授，他在东南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也曾短期执教过，教设计与电脑辅助设计课程。他上课通常从下午两点钟讲到六点钟，自己一边示范写程序，一边讲授与指导。上完4个小时的课，学生都累极了，他还是神采奕奕。同样是做老师，他那4个小时的效率比我们要高很多，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这反映在人均GDP上，瑞士人均GDP是5万美元，香港是3万美元，

深圳是1万美国。第四个例子，富士康科技集团刚刚宣布要采购100万台机器人，我们也在高交会上看到了不知疲倦的机器人，单纯从生产角度来讲，这说明人类还不够快。所以在这里唱些反调，因为现在还不是我们该慢下来的时候，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上几代人都没快过，或者说老想停下来，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以更快的方式补回过去的慢。

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可政治变革有没有跟上？速度对于个人也可以有很多阶段，我有个体会，前些年在大陆做设计确实很慢，两三年做一个项目设计。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团队设计的速度变得非常快。虽然做很小的项目，但我们是发明系统，是产品级的东西，可以交给工厂，让工厂复制。我刚谈的效率提升方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同意建筑师只是被推着走的那一部分人。我们看电影《骇客帝国》第三集时，总算在控制室里看到了母体的“父亲”，这个人在电影里面叫“architect”，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名片也印有“chief software architect”，当你从建筑院校毕业考了证书可以称自己“architect”。但这并非不是不断突破、不断产生新的思维来引领社会的“architect”。前者是被动的、局部的和无法创新的，后者则是通过工作，改变了身边人的认识与知觉，最终让大众明白物质上的选择和社会、政治上的选择其实是一回事。